

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李红波¹, 杨和平², 齐梦娜¹

(1.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2.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江西 南昌 330108)



摘要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载体, 可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系统性赋能路径。基于价值网络理论, 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生态、文化、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功能价值体系, 乡村全面振兴涵盖生态、文化、产业、组织与人才的五维协同目标, 二者通过“传统智慧—现代技术—政策工具”形成深度嵌合的价值网络机制。然而, 当前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仍面临认知偏差、业态同质化、要素配置失衡及主体断层等现实困境。为此, 应筑牢传统生态技艺与现代绿色技术融合赋能的生态基底, 激活农耕文化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创新的文化价值, 激发遗产资源编排与三产联动增效的产业动能, 优化自组织与党建引领协同共治的治理机制, 强化传统知识赓续与现代教育科技赋能的人才支撑。最终通过多维路径联动与系统集成, 构建面向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实践范式。

关键词 农业文化遗产; 乡村全面振兴; 价值网络; 农耕文明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25)06-0118-09

DOI编码: 10.13300/j.cnki.hnwxkb.2025.06.011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正式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保护计划, 旨在识别和保护具有“动态保护、适应性管理”特征的传统农耕系统^[1]。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所在地域, 不仅承载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生态知识^[2], 更通过“人与自然共生”实践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范例。中国积极响应 GIAHS 倡议, 截至2025年7月已拥有2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位居全球首位。同时, 2012年起由原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牵头, 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 nation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hina-NIAHS)发掘工作, 迄今已开展共计七个批次、认定 China-NIAHS 达188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也强调, 要“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中国农耕文明历史璀璨, 孕育了内涵丰富、分布广泛和价值多元的农业文化遗产, 涵盖稻鱼共生、梯田系统、游牧文化等多元类型, 其保护与活化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意义^[3], 不仅体现了生态—文化—经济复合系统的可持续性, 还为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4]。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蕴藏着激活乡村全面发展的巨大传统智慧和强大内源动力, 不仅为乡村振兴注入历史文脉的根基力量, 更能通过生态农业技术复原、传统知识体系重构和特色产业培育, 有望成为破解乡村生态退化、文化断层、产业空心化等难题的关键抓手之一。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生

收稿日期: 2024-11-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乡融合导向的土地多功能利用空间关联网演变机制”(41871179);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动态演化机理与政策响应研究”(25YJ13)。

态、文化、经济、社会及教育价值,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文化、产业、组织、人才目标之间,在价值生成与作用机理层面呈现出深度耦合与互构关系。然而已有研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价值,以及在保护发展过程中外溢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潜力,缺乏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全面振兴“价值链接”的系统框架和路径策略^[5]。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向乡村多维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仍需理论深化与实践探索。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基于价值网络理论的视角,揭示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网络关系,并深刻剖析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现实困境,以期为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路径依据。

一、文献回顾

1. 价值网络理论

价值网络理论作为商业领域战略管理的研究范式,通过解构多元主体间的非线性互动关系,强调多元主体通过动态协同与资源整合实现价值共创^[6]。价值网络理论提出以网络化结构替代传统价值链的线性模型,将企业、用户、供应商、竞争者及互补者等异质性主体纳入协同体系,实现资源整合与能力互补,最终形成动态演化、共生互嵌的价值创造生态系统^[7]。相较于价值链的单向流动模式,价值网络具备三个主要特征:结构维度上突破组织边界,构建多中心网状拓扑;机制维度上依赖信息共享与契约柔性化实现协同增效;目标维度上追求网络整体价值最优化而非个体收益最大化。将价值网络理论迁移至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的关联研究,可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本质上是一个活态价值网络,其生态技艺、文化实践、经济模式等,通过与政府机构、文旅企业、社区组织、原住地居民及消费者等主体的深度交互,持续生成复合价值流。比如,价值生成层面,遗产系统中的传统知识构成网络节点,稻鱼共生等传统技术通过现代认证体系转化为地理标志品牌,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跃迁^[8];资源整合层面,多元主体协同形成价值连接,通过“合作社+电商平台+非遗工坊”等架构,将分散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编排为三产融合产业链等。因此,价值网络理论为破解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矛盾提供了新的认知工具,可以作为分析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全面振兴内在价值关联问题的理论基础。

2.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其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逐渐引发学界关注。现有研究普遍从赋能的具体视角和路径进行切入,揭示其在经济、文化、生态维度的复合赋能机制。经济上,农业文化遗产构成了推动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内生驱动力^[9],可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如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还能依托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为乡村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伽红凯等的研究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揭示了农业文化遗产循序渐进地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不同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多方面支持^[10]。文化方面,研究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传统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增强乡村文化自信,丰富乡村文化内涵,促进乡风文明建设^[11]。杜华君等认为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可为乡村振兴提供内源性动力^[12]。生态上,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有利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的目标,例如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的生态农业模式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为乡村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13]。实质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实践与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已在部分遗产地深度融合,比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通过“生态技艺传承+品牌化运营”,实现了传统农业遗产的经济增值与生态保护双赢^[14],印证了农业文化遗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可行性,为全球提供了“传统智慧赋能现代转型”的典型范本^[15]。

目前关于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关系研究,已突破原来的农业文化遗产和乡村振兴相互割裂的阶段,由单一的理论研讨转向部分系统的实践验证,在文旅融合、生态农业、非遗产业化等领域,形成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样本。但与此同时,已有研究尚未构建起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禀赋与乡村振兴多维目标的价值耦合,在现实困境、要素支撑、价值联结、主体互馈

等方面的机制和路径挖掘还不够,制约着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体效能。

二、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网络机制

1. 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

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价值主要体现为生态、文化、经济、社会、教育等五大维度。一是生态价值,通过梯田水土保持、基塘循环系统等传统生态技艺,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可持续基础,更通过生态伦理的传承强化人与自然共生理念,为其他价值的实现奠定物质与精神双重保障^[16]。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水资源循环利用和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四素同构”体系的生态修复功能。二是文化价值,通过农耕记忆的活化与创新表达,重构乡村文化认同与内生凝聚力,将传统农耕文化嵌入现代数字语境,形成跨地域的文化传播网络,不仅强化了社区对本土知识的集体认同,还反哺生态保护意识的自觉延续^[17],形成“文化活化—生态维护”的良性循环。三是经济价值,以资源编排为核心机制,通过地理标志认证、三产联动与电商赋能,将遗产的生态与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四是社会价值,通过自组织机制协调多方利益,优化治理效能。如贵州从江依托村民共管与村规民约,实现梯田水资源的精细化分配,既保留传统管理智慧,又通过党建协同增强治理合法性,形成“本土规则—现代制度”的双轨治理框架。五是教育价值,通过代际传承与现代技术融合,为网络注入持续创新力^[18]。传统知识的活态传承以师徒制、家族口授为核心路径,如哈尼梯田的“木刻分水”技艺主要依赖代际实践;而现代教育通过科技小院、数字化平台将传统技艺与物联网监测、电商运营等新技术结合,培育兼具生态智慧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新农人。

由此,农业文化遗产通过生态维度的绿色基底构建、文化维度的认同价值重构、经济维度的三产融合赋能、社会维度的多元主体协同及教育维度的知识传承创新,构建“保护—活化—共享”体系,在维系农业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同时,推动其功能价值向乡村振兴的多维目标转化,系统激活乡村振兴的生态韧性、文化自信、产业动能、治理效能与人才活力,为农业文化遗产多维度价值转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共生互促,提供兼具文化根脉性与技术前瞻性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2. 乡村全面振兴的五维协同

乡村全面振兴包含生态、文化、产业、组织与人才五个关键维度,通过多维协同打破传统乡村发展的单一化壁垒,形成“共生—互馈—增效”的可持续发展范式。生态维度体现为绿色技术与传统生态智慧融合,通过水土保持、循环农业等实践构建环境韧性,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资本转化。文化维度表现为乡村文化活态传承与数字传播创新,借助文化符号再生产强化集体认同,并为IP衍生开发提供价值基础。产业维度重点在于三产融合的资源编排,以地理标志认证与消费场景延伸,实现传统生产模式的增值重构^[19]。组织维度反映在“传统自组织+党建引领”的复合治理架构,通过柔性协商与制度刚性保障多元目标协同。人才维度呈现传统知识代际传承与现代技能教育的双轨并进,二者协同机制既避免传统技艺的断层危机,又通过“本土智慧—现代创新”的嫁接,培育兼具本土智慧与创新能力的复合主体^[20]。

基于此,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过程中,资源基底的有效保护和文化价值的有机实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五大维度发生复杂的动态反馈,有利于形成“生态韧性—文化认同—经济增效—治理优化—人力创新”的协同网络。政策工具通过战略规划、资金配置、法规保障,为要素流动与目标协同提供制度框架;市场机制通过价值发现与资源配置,激活文化遗产的多重效益;社区参与则依托文化自觉与技术适配,增强发展的内生性与包容性。例如,生态补偿政策激励社区参与环境修复,文化保护基金通过文旅收益实现再投入,形成“保护—利用—再生”的路径,不仅推动乡村从“外部依赖”向“内生驱动”转型,更通过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破解了资源割裂、目标冲突等传统难题。

3. 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网络机制

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价值体系,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五维目标协同,形成深度交互耦合(图1),构成了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网络机制。

一是生态价值通过系统观与方法论锚定乡村生态振兴。作为网络基座,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价值通过传统生态技艺智慧赋能生态振兴,其内涵不仅包括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等显性功能,更蕴含天人合一的系统观与循环再生的方法论,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认知框架与技术范式。

二是文化价值借助符号再生产机制驱动乡村文化振兴。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驱动乡村文化生态的自我更新,强化文化振兴,比如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四季生产调”,以乡土符号为介质重塑文化认同,形成兼具传统特质与现代适应性的文化再生产机制。

三是经济价值依托资源编排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以资源编排为核心机制,通过经济收益反哺生态保护投入^[21],借助就业机会吸引城乡要素流动,推动产业振兴。其中资源编排包含要素识别、组合优化与价值捕获三个递进阶段,构建起“生态资源—文化资本—经济价值”的转化方式。比如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整合茶旅体验、电商直播、非遗手作等资源,形成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

四是社会价值借由弹性治理网络赋能乡村组织振兴。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通过自组织机制,降低治理成本与提升执行效率,创新驱动组织振兴,其作用路径体现在社区共识凝聚、治理规则内生及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形成弹性化、网络化的新型治理结构^[22]。

五是教育价值通过知识融合创新支撑乡村人才振兴,农业文化遗产蕴含丰富智慧,其教育价值通过代际传承与知识融合,以人力资本创新注入迭代升级动力,支撑人才振兴,具体表现为传统农耕知识与现代科技知识的互补共生,以及在地化知识体系与标准化教育体系的有机衔接。

在此基础上,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五维协同,通过“传统智慧—现代技术—政策工具”的多维赋能,形成了深度嵌合的价值网络机制。传统智慧提供底层逻辑与文化根脉,其核心在于遵循自然节律的适应性管理、基于资源禀赋的集约化利用、依托社区共识的集体行动,构成本源支撑。现代技术通过数据监测、智能调控等手段提升效率与适配性,例如运用物联网实现农田生态系统的动态感知,借助区块链技术确保传统技艺的知识产权保护,构建“数字孪生”与“物理实体”的交互反馈机制。政策工具则通过制度设计优化要素配置,重点在产权界定、利益分配和风险防控等层面创新,包括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构建多主体风险共担机制等。

三、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现实困境

1. 认知困境:价值认知偏差与保护理念模糊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首要困境在于认知层面存在系统性偏差。地方政府与开发主体对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缺乏科学认知,普遍存在“重经济指标、轻文化传承”的短视思维。在 GIAHS 框架影响下,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呈现出“西方话语体系主导、本土解释能力弱化”的认知错位,部分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将申报等同于旅游开发工具,导致农耕智慧、生态价值等核心要素被边缘化。价值判断过度聚焦经济转化效益,致使传统农业知识体系、生态智慧等非物质要素的挖掘率偏低^[23]。认知模糊直接导致战略定位失准,大部分遗产地规划存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化倾向,对遗产的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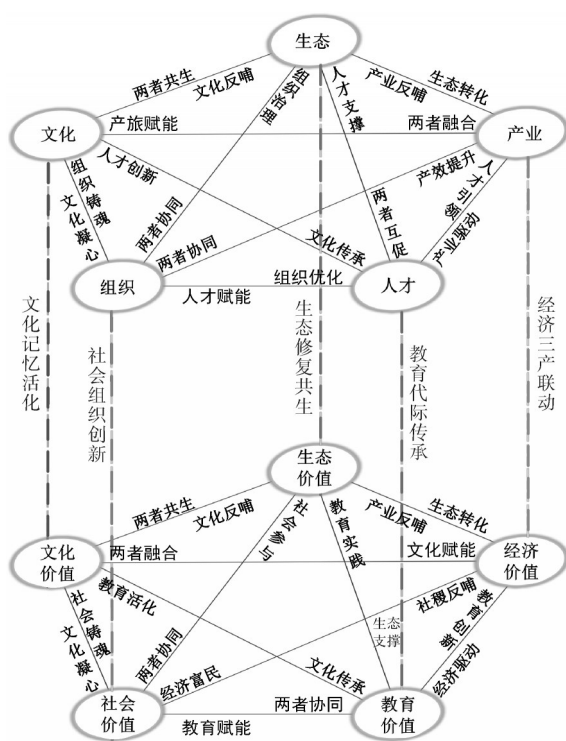


图1 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网络关联机制

合价值缺乏系统认知框架。这种认知局限在实践层面表现为保护与开发的失衡,例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虽在2005年入选全球首批农业文化遗产,却因外地田鱼品种流入导致本地传统育苗技艺面临失传风险,反映出对种质资源原真性保护的忽视。

2. 业态困境:产业融合链条断裂与创新动能不足

农业文化遗产产业化面临“纵向延伸不足、横向联动乏力”的结构性矛盾:其一,三次产业融合存在表面融合、实质分离的脱钩现象,大部分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停留于观光农业初级形态,未能形成“生产—加工—服务”的增值链条。比如,浙江仙居古杨梅群虽打造了“梅—茶—鸡—蜂”复合种养模式,但其深加工产品种类有限,未能充分延伸产业链。其二,数字技术应用率不足,导致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化受阻,仅有极少部分非遗项目建立数字化保护系统。其三,产业协同网络尚未形成,跨领域合作仍需探索,致使遗产资源转化率长期处于低位,创新动能不足直接导致业态同质化,造成“千村一面”的文化景观危机。

3. 要素困境:资金要素支持与政策协同缺位

资源要素配置的结构性矛盾严重制约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效能,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资金投入呈现“三极分化”态势,国家级、省级和未申报项目的保护资金差距巨大,导致中西部地区因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小而大量优质资源处于待开发状态。政策工具包存在明显缺陷,地方政策主要侧重基建补贴,对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软性投入占比不足。比如江苏兴化市设立垛田保护基金,每年投入超3000万元用于河沟疏浚,并通过《泰州市垛田保护条例》强化法律保障,十年累计投入13亿元实施退圩还湖工程,展现了政策与资金的协同效应。金融支持体系尚未健全,多元资本参与的激励机制缺失,社会资本因产权模糊和回报周期长而参与不足,呈现“城市资本下乡难、本土资本规模小”的双重困境^[24],亟需推动要素配置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4. 主体困境:传承断层与人才引育滞后

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主体结构失衡。受城镇化进程、农业比较效益低、乡村文化建设羸弱等影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在地农民培训不足同步发生,农业文化遗产人才流失和断层现象明显,“社会落后—人才流失—二度衰落”的恶性循环难以抑制,依附于劳动者之上的耕作经验、本土性知识技能传承稳定性受到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科技人才引育不足。农业文化遗产涉及的多领域研究创新需要构建跨学科专业团队,如文物考古、生物多样性维持、景观稳定、文化保护传承、产业体系建设等,诸多科学问题需要大量科技人才研究解决。然而,当前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人才培养尚属于基础阶段,培训锻炼模式仍较单一,数字技术、文化科技新型知识体系的建设历程还比较短,缺少国家重大项目和连续资金项目支持,“产(产业)—学(高校)—研(科研机构)—金(资本)—介(中介服务)—用(成果应用)”的一体化协同育人平台和机制尚未建立,难以满足农业文化遗产对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四、面向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路径选择

1. 生态基底筑牢:传统生态技艺与现代绿色技术融合赋能

一是传统生态技艺的传承与实践。农业文化遗产中的传统生态技艺是农耕文明适应自然环境的智慧结晶^[25],具有系统性、可持续性和地域适应性特征。例如,云南哈尼梯田通过“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体系,构建了自上而下的水土资源管理网络:森林涵养水源、村寨布局避让生态核心区、梯田层级蓄水、水系循环利用,形成“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生态平衡。珠江三角洲的基塘系统则以“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塘泥肥田”的循环模式,实现种养业与湿地生态的有机协调。加强传统生态技艺保护传承,适应坡地防蚀、水资源匮乏等特定自然条件,并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强生态韧性,持续为现代生态农业提供“低投入、高产出”的可持续范本。

二是传统与现代技术的协同创新。传统生态技艺与现代绿色技术的融合,通过“数据赋能”与“技术迭代”实现生态振兴。例如,哈尼梯田在保留木刻分水、冲肥法等传统技艺的同时,引入梯田生

态监测系统,实时追踪水质、土壤肥力与生物多样性变化,优化水资源分配与耕作周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结合物联网技术,通过传感器监测鱼群活动与水稻生长,精准调控饲料投放与病虫害防治。由此,要推动传统技艺的生态伦理保护,并强化现代技术弥补其效率短板,推动形成“传统智慧保底线、现代技术促增效”的协同模式。例如,基塘系统升级为“种养—加工—旅游”复合产业链后,不仅延续了生态循环逻辑,还通过光伏补光、水体净化等技术提升单位产值,推动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8]。

2. 文化价值激活:农耕文化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创新

一是农耕文化的活态传承。农业文化遗产承载着千年农耕文明的精髓,其文化价值体现在农耕技艺、节庆民俗与生态伦理的深度融合中。例如,浙江青田的“开镰节”与“鱼灯舞”通过仪式展演,将稻鱼共生系统的生态智慧转化为文化符号,强化了对传统农耕的认同。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则通过代际传承的农耕技艺与祭祀仪式等民俗活动,形成独特的文化记忆网络,维系了村民对土地的情感联结。要进一步强化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实践,构建地方性知识体系核心,以“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塑造乡村社会的集体认同,为文化振兴提供了内生动力。

二是农耕文化活化与文旅融合创新。农耕文化的活化通过文旅融合实现价值转化,形成“文化资源—旅游体验—经济增效”的创新路径。例如,浙江青田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品牌为依托,开发研学旅游与节庆体验项目,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推动非遗技艺向文旅IP转化。贵州从江则通过短视频平台传播稻鱼鸭系统的耕作场景,将传统农耕文化嵌入现代消费场景,实现文化符号的跨地域传播。强化多维融合保留文化本真性,借助VR/AR导览等数字化技术增强体验感,形成“传统节庆活化+数字传播+产业延伸”的立体模式,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可持续活力。

3. 产业动能激发: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编排与三产联动增效

一是通过资源编排,整合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构建产业动能。农业文化遗产的资源编排是通过系统性整合生态、文化、经济价值,将遗产地的独特资源转化为乡村产业优势的关键路径。例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通过地理标志认证与品牌化运营,将传统农耕技艺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青田田鱼”区域公共品牌,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遗产地的景观资源被编排为文旅IP,通过节庆活动与研学旅游吸引消费流量,不仅保留了遗产的生态与文化本底,还通过“资源—产品—市场”的链条设计,强化资源编排效能,充分挖掘遗产的多功能性,借助合作社管理等制度设计与技术创新,实现资源价值从“存量”到“增量”的转化。例如,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将茶园生态、制茶非遗技艺与茶旅体验深度融合,构建茶园观光、茶叶加工、文化体验的全产业链。

二是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编排与一二三产业联动的深度融合。农业文化遗产通过“农业+加工+服务”的产业链延伸,形成乡村经济增效的乘数效应。例如,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将传统生态资源编排为“有机种植—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湿地旅游”联动模式,农户通过直播带货销售龙香芋等特色产品,同时吸引游客体验垛田农耕文化,实现“一产提质、二产增值、三产引流”的价值链。在此过程中,遗产地的生态文化资源成为三产融合的黏合剂:农业提供绿色原料,加工业提升产品附加值,服务业则通过文旅体验增强品牌溢价,形成的联动机制依赖于资源编排的精准性。例如浙江青田通过“公司+农户”模式整合分散资源,将稻鱼产品统一标准、统一营销,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网络。基于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三产联动,放大农业文化遗产经济价值,通过就业机会创造与产业链延伸,推动乡村从“资源输出”向“在地增值”转型,为产业振兴提供可持续动能。

4. 组织治理效能:自组织机制与党建引领协同共治

一是推动自组织机制的内生性治理实践。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自组织机制是乡村组织振兴的内生动力,其核心在于乡村居民基于共同文化认同与资源依赖形成的自主管理网络。例如,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通过“沟长制”实现梯田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由村民选举产生沟长,负责水量分配与纠纷调解,形成“村规民约—传统技艺—集体行动”的治理模式。依托血缘、地缘关系构建信任基础,通过代际传承的生态知识降低治理成本,并借助祭祀仪式等非正式制度强化集体责任感。要进

一步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地自组织机制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优势,快速响应环境变化^[26],同时避免科层制管理的僵化问题,为乡村治理提供韧性支撑。

二是加快自组织与党建协同的治理创新。农业文化遗产地通过党建引领与自组织机制的协同,形成“政治引领—文化赋能—制度保障”的融合路径,提升治理效能。例如,云南哈尼梯田成立专业合作社,由基层党组织牵头整合政府、企业与村民资源,将传统自组织规则纳入合作社章程,形成“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治理架构。在此过程中,党组织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下沉,强化自组织机制的合法性与执行力。同时,自组织的文化传统为党建提供本土化载体,推动生态修复等政策目标与群体利益的一致性,既要保留自组织的灵活性,又需要通过党建的制度化保障规避其碎片化风险,在此过程中,借助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主体协同,为乡村组织振兴构建传统和现代双轮驱动体系。

5. 人才支撑强化:传统知识赓续与现代教育科技赋能

一是推进传统知识传承的代际延续。农业文化遗产中的传统知识是乡村人才振兴的根基,其传承依赖于师徒制、代际传递等本土化路径。例如,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插秧—养鱼”技艺通过家族口传身授延续千年,农户在实践中掌握水温调控、鱼苗培育等核心经验。哈尼梯田的水资源管理知识则通过代际传递,年轻学徒需跟随长辈学习木刻分水、冲肥法等技艺,确保梯田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要进一步强化这一传承模式,保留好地方性知识体系,通过仪式、民俗强化文化认同,加快构建“知识—实践—信仰”逻辑链,为乡村储备具备生态智慧的本土人才。

二是保障传统知识与现代教育的协同赋能。现代教育通过技术融合与制度创新,为传统知识传承注入新活力。例如,中国农业大学在遗产地设立“科技小院”,将传统种养技艺与现代土壤检测、物联网技术结合,培养既懂“稻鱼共生”又掌握现代技术的复合型新农人^[27]。短视频平台则成为文化传承新载体,侗乡青年通过直播展示稻鱼鸭系统的耕作流程,吸引城市消费者参与农事体验,实现知识传播与经济收益的双重突破。此外,高校开设“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课程,系统梳理传统知识的科学内涵,推动其与现代生态学、经济学的理论对话。要加快双向协同机制,避免农业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的“博物馆化”^[18],以教育赋能提升人才的创新能力,为乡村人才振兴目标构建“本土智慧—现代技术—跨界融合”的系统培育体系。

6. 多维协同耦合:路径联动与系统集成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基于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网络机制,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价值通过资源编排机制实现系统联动。生态资源、文化符号与经济要素被整合为产业链条,构建“生态修复—文化活化—产业增效”的发展模式。通过政策工具与三产联动市场机制的耦合,放大资源的综合效益,推动乡村从单一发展向全域振兴转型。自组织机制与党建协同的治理模式是核心支撑。传统社区规则与现代制度结合,形成“文化认同—组织效能—制度保障”的治理网络,并通过“本土经验—政策引导—技术赋能”的融合,提升治理韧性,确保生态、文化、产业等多目标的协同实现。传统知识传承与现代教育协同,为路径创新提供持续动力。师徒制与科技小院结合,培育既懂传统技艺又掌握现代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形成“代际传承—技术迭代—创新扩散”的反馈循环。例如,短视频平台传播农耕技艺,吸引青年返乡创业,推动遗产价值向新业态延伸。依此动态协同,通过“文化自信—人力资本—经济活力”的转化,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能。

农业文化遗产通过生态、文化、经济、社会、教育五大价值维度协同转化,系统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生态技艺修复环境基底,农耕文化重构认同内核,资源编排激活三产融合,自组织机制优化治理效能,知识融合培育复合人才。这五条路径借力资源整合、治理协同、动态反馈的多级联动形成网络效应,最终在生态韧性奠基、文化认同赋能、经济增效驱动、治理优化保障、人力升级支撑的协同作用下,构建兼具文化活态传承、技术智慧迭代的可持续的乡村全面振兴范式。

五、结 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载体,通过生态、文化、经济、社

会与教育功能的网络化协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系统性赋能路径。研究表明,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网络关联机制体现为“传统智慧—现代技术—政策工具”的动态耦合:传统生态技艺与现代绿色技术的融合重构了生态韧性;农耕文化的活态传承与数字化传播重塑了乡村文化认同;资源编排机制通过产业链延伸等,释放经济增值潜力;自组织治理与党建协同优化了乡村治理效能;传统知识的代际传承与科技小院教育结合,为人才振兴注入创新动能。然而,当前保护实践中仍存在认知偏差、业态同质化、要素配置失衡与主体断层等现实困境,需通过政策协同、科技赋能与社区共治构建多维动态反馈机制。未来应进一步强化文化遗产价值网络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深度嵌合,以“动态保护—创新活化—共享发展”的系统路径,推动生态修复、文化认同、产业增效、治理优化与人力资本的协同升级,最终实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双向互促,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兼具文化根脉性与技术前瞻性的中国范式。

参 考 文 献

- [1] 闵庆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J].资源科学,2006(4):206-208.
- [2] 王玢,宋希法,刘思雨,等.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划方法研究——以湖北恩施玉露茶文化系统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5,40(5):1412-1428.
- [3] WANG W, STRAFFELINI E, TAROLLI P. Steep-slope viticult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micro-water storage in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to weather extremes[J].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2023, 286: 108398.
- [4] PANARO S, DELABRE I, MARSHALL 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clusive and effective nature-based solution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5, 230: 108525.
- [5] 王智伟,陈晖,伽红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驱动全面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典型模式与实践进路[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7(2):106-116.
- [6] PEPPARD J, RYLANDER A. From value chain to value network: insights for mobile operator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24(2-3):128-141.
- [7] 孙艺荧.农业企业联农带农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基于价值网络视角的多案例分析[J].农村经济,2023(4):105-113.
- [8] ZHANG Y, LI X, MIN Q. How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erva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AH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204: 553-563.
- [9] 吴少伟,郭星星.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4,16(6):125-133.
- [10] 伽红凯,卢勇.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与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2):53-61.
- [11] 龙文军,张莹,王佳星.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解释与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19(12):15-20.
- [12] 杜华君,张继焦.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与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动力——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人类学分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6):103-111.
- [13] 周小凤,张朝枝,蒋钦宇.遗产化与旅游化对地方文化记忆系统的影响——以元阳哈尼梯田为例[J].人文地理,2022,37(4):182-191.
- [14] XIE J, WU X, TANG J J, et al.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rice varieties in a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GI-AHS): Rice-fish co-culture[J].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China, 2011, 10(5):754-761.
- [15] SONG C J, SUN R H, SHI Z L, et al.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China[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2, 42(6):624-632.
- [16] 吴思睿,吴忠军.农业文化遗产地“三生空间”的生态智慧——以桂林龙脊梯田为例[J].社会科学家,2025(2):82-88.
- [17] 吴灿.农业文化遗产: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演变[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2):33-41.
- [18] 丁绍刚,黄俏俏.生态博物馆理论与践行模式对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J].中国农史,2017,36(6):130-138.
- [19] 易法敏,古飞婷,刘晓风.平台资源编排、价值共创与农村电商生态系统演化[J].农业经济问题,2024(9):94-109.
- [20] 向红玲.大力推进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24(1):55-61.
- [21] 张梦玲,鲍海君.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设立的共同富裕效应——基于浙江省的一项准自然实验[J].自然资源学报,2024,39(11):2639-2656.
- [22] 韦俊峰,明庆忠.自然的社会建构中“人—自然—地方”关系网络——龙脊梯田农业文化遗产案例[J].地理科学,2025,45(4):711-720.

- [23] 陈加晋.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的百年进路与本土化建构[J]. 中国农史, 2023, 42(3): 127-138.
- [24] 刘茜昀, 史达, 张琳.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视角[J]. 社会科学家, 2024(2): 140-146.
- [25] 伽红凯, 王庆霖. 传统农业智慧的保护传承与价值重塑[J]. 农业考古, 2025(1): 199-205.
- [26] 王丹, 赵新力, 郭翔宇. 农业科技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农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与建设思路[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5): 67-78.
- [27] LU J, LI X. Review of rice-fish-farming systems in China—One of the globally important ingeniou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J]. Aquaculture, 2006, 260(1-4): 106-113.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Pathway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LI Hongbo, YANG Heping, QI Mengna

Abstract As living carriers of traditional farming civilizatio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HS) provide systemic pathways to empower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Grounded on the value network theory, AHS embodies an integrated functional value system encompassing ecological, cultural, economic, social, and educational dimensions, whil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ims to achieve synergistic goals across five domains: ecology, culture, industry, organization, and talent. The two are deeply interlinked through a value network mechanism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wisdom, modern technology, and policy instruments. Nevertheless, with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HS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still face multiple practical dilemmas including cognitive biases, homogenization of industrial forms, imbalance in factor allocation, and the disconnection of key stakeholder.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t is essential to strengthen the ecological foundation that integrate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techniques with modern green technologies, activate cultural value of living agricultural heritage via innovative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stimulate industrial momentum by orchestrating heritag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optimi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rough self-organization and Party-l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reinforce talent support by sustain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systems while leveraging modern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ltimately, by promoting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and systemic integration,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practical paradigm for AHS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advance the goals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value network; agrarian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金会平)